

抗美援朝中毛泽东如何“调兵遣将”

□ 刘步珏 释清仁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谁来打”既是用人问题，也关乎战争能否打赢。无论是选配主要指挥员、建立指挥机构，还是挑选作战部队，毛泽东都慎重考虑与决策，体现了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选配骁勇善战的高级指挥员

对于出兵朝鲜，毛泽东虽有充分考虑，然而由谁挂帅出征，却是颇费了一番思量。他首先想到的是粟裕，可当时粟裕有病缠身正在调养，一时无法到任。时间和局势变化不等人，毛泽东最终想到在大西北主政的彭德怀。虽然当时西北形势仍然紧张，调离彭德怀也是万不得已，但毛泽东深知彭德怀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经过简单沟通，彭德怀很快领会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欣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入朝前彭德怀曾打趣自己是命中注定要和苦地方打交道，并说：“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打交道。没有穷、苦，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正是具备了这种为人民出生入死、不惧艰难困苦的品质，这场“开国第一战”的历史重担才由他来承担。

毛泽东认为，现代战争的指挥员要具备高于常人的战略眼光，才能更好地将指挥军事行动放在全局盘子里进行谋划。毛泽东选定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身上，就鲜明体现了这种宝贵的战略素质。在最初接受任务时，彭德怀就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入朝前，第13兵团将领曾联名致电彭德怀：在缺少高射炮又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出兵朝鲜的行为弊多利少，建议推迟出动到空军

能够出动、装备确有保证的时候。彭德怀怎不知没有空军掩护的仗有多难打，但他下定决心要和敌人抢时间。为此，困难再多、再大也要出动，否则将会更被动。正是因为彭德怀能在复杂战场形势下保持清晰判断，坚定执行中央战略决定，及时排除杂音，才使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迅速改变了战场局势，打乱了敌作战部署，使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方手中。

毛泽东认为，将无勇则不为将。他选择的挂帅抗美援朝的将领都是战功赫赫、威望极高。比如粟裕，他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军事素养极高，又足智多谋，在解放战争中因“七战七捷”被称为“战神”，无疑是作为胜战核心之不二人选。最终挂帅的彭德怀，他带领西北野战军以少胜多，“三战三捷”保卫党中央的佳话一直传颂，毛泽东用“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他挂帅，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志愿军当时的一些弱点。

建立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

我军的高级统帅机关，自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就是以非常精干高效的班子进行运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最高统帅机关仍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由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20多人。抗美援朝战争中，第13兵团司令部、政治部改组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了志愿军总部。总部机构很精干、灵活。司令部只有作战、情报、通信、军务、机要、直工、行政七个处和一个办公室，政治部只有五个部（处）。这样安排，既保证了作战指挥的集中统一，又能够充分发挥一线将

领的核心作用和集体智慧。

作为志愿军总部前身的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的建立虽然可谓一波三折、几经调整，但这却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进行配备的。一方面，毛泽东确定的指挥机构从作战上说较为有利，配备了作战经验丰富、指挥才能出众的邓华担任司令员，选配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等作为其得力干将；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部队的实际，保留了第13兵团主任杜平及组织部门。这样的搭配不仅使战前准备得到了保证，而且给指挥机构以时间磨合，为后来以13兵团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总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历来重视指挥部的安全问题，志愿军总部办公地点是由彭德怀亲自选定的大榆洞，位于平安北道朔州郡南北两座大山之间夹着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里。1950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专门提醒指挥部的安全问题，指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慎重选择参战部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而当时东北边防力量薄弱，在敌人进攻面前，如果不成立东北边防军进行制止，不仅朝鲜有沦亡的危险，我国大陆的和平建设也将无法进行。成立东北边防军我们就有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基于对美国干涉和朝鲜战争持久化的预期判断，果断决策以第13兵团为主成立东北边防军。毛泽东这般堪称用兵典范的战略预置，为取得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对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仍极具战略眼光。

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时期只有陆军一个军种，依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知，我军即将面临的现代战争形态与之前是完全不同的。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力量非常弱小。毛泽东慎重考虑了使用空军的需要与可能、眼前使用与长远建设的关系，权衡利弊后毅然作出了空军参战的决策。在战法打法上，毛泽东肯定了刘亚楼提出的不能零零碎碎地去同敌人进行拼消耗的空战，应积蓄起来选择适当时机集中分批地使用原则。志愿军空军在2年零8个月的作战中，取得了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的重大战果，创造了让敌人惊悚的“米格走廊”，在掩护后方重要目标安全、保障后方交通运输的畅通和开创我军多军种协同作战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为什么在第一次战役后，调驻扎在上海的第9兵团进入东线战场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与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谈话中得到解答：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的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的目的就在于此。毛泽东这里的“用人所长”是指，宋时轮曾是华野十纵的司令员，而他带领的十纵，有号称“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用部队所长”是指，第9兵团下辖的3个军都是我军的王牌部队。毛泽东认为，既然陆战1师号称美军的头号王牌，那么我们也要派出解放军能打硬仗的王牌，来一个“王牌对王牌”。事实也证明，在接下来的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给美军以巨大打击，展现了顽强能战的战斗精神。



袁国平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在危急时刻总是挺身而出，甘愿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在皖南事变中，他用年轻的生命兑现了将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的庄严承诺。袁国平被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为首批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906年5月26日，袁国平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县（今邵东市）。1916年，袁国平考入当时被誉为“革命风向标”的宝庆循程小学。少年时期的袁国平胸怀凌云之志，一次在登上余湖山之后，他有感而发，写下“万山围绕乱如麻，何处登临望眼赊；堪羨高峰能独立，巍然不被晚云遮”的诗句。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邵阳时，袁国平在校长和老师的带领下，积极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此时的他阅读了各种进步书刊，视野更加开阔，为他后来义无反顾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2年，16岁的袁国平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袁国平阅读了很多爱国主义的书籍，参加了几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表现出了过人的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在同学们的推举下，袁国平当选为湖南省学联执行委员。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湖南省教育学会举行追悼会，袁国平写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挽联，表达了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

1925年10月，袁国平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校的训令明确规定学生可以阅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书籍，袁国平因此阅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经常给学员讲课、作报告，在这些共产党人的熏陶和影响下，袁国平的政治觉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25年底，他坚定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为革命献身的信念坚如磐石。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袁国平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长，此后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率军叛变，乘虚进攻武汉。时任武昌卫戍司令的共产党员叶挺率领部队发起反击。在危急关头，袁国平将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加入到反抗叛变者的队伍中。出发前，他给母亲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在照片的背面写了一封信：“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博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不久，反动势力溃不成军，叶挺率领的部队成功地平定了这次叛乱。

然而，1927年4月至7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残忍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袁国平奉命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袁国平参加广州起义。从1930年冬年起，袁国平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袁国平领导各级干部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由于工作卓有成效，他接连升任红三军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和代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八一”红星奖章。红军到达陕北后，袁国平奉命参与创办红军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干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袁国平主动要求上前线奋勇杀敌，坚定地表示愿为抗战胜利英勇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

袁国平：将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

□ 李姝苹

“决不当俘虏！”

袁国平的政治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认可。毛泽东称赞他“政治开展、经验亦多”。1938年3月，袁国平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扛起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一面大旗。他对多年的政治工作作了全面细致的总结，并在两次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为系统地开展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使其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环境，袁国平依据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主持起草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于1939年4月颁布试行。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起反共活动，面对国民党的猖狂进攻，皖南新四军部队9000余人奉命向北转移。然而此时，国民党军队早已埋伏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的山林里，新四军遭到重兵包围。面对国民党的“围剿”，袁国平大义凛然，他动员部队：“皖南的新四军就像池塘里的龙，无用武之地，出去就活了。龙入大海，威震四方，将使敌人丢魂丧胆。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进行袭击，给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的新四军！如果我们有一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一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新四军经过几天几夜的誓死抵抗，但最终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仍然指挥部队继续突围。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激烈战斗中，袁国平不幸身中四弹，为了不连累战友，他饮弹自尽。这位不足35岁的新四军高级将领，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优秀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英雄凯歌。

揭开华中抗战反攻序幕的车桥战役

□ 许江

1944年3月5日至13日，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部队在粟裕率领下，向盘踞在江苏淮安车桥地区的日伪军发起车桥战役。这次战役对日军重要设防据点实施攻城打援，打乱了日伪军“清乡”“屯垦”计划，打通了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地区之间的联系，揭开了华中地区抗战战略大反攻的序幕，被陈毅等人誉为“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成为新四军华中地区歼灭战的典型战例。

着眼全局，周密部署。1944年，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由反“扫荡”为主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作战。驻苏中的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同时为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也决定适时开展对日军的局部反攻。2月，在中共苏中区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粟裕提出了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以改变各个分区被分割的被动局面，将苏中地区建成牢固的后方基地。

车桥居淮安县城、泾口、泾河、曹甸之间，系淮安东南重镇，地理位置险要，是联系苏北、苏中、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也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1943年2月，日军大举“扫荡”，占领并盘踞车桥，加高围墙，扩宽外壕，编设铁丝网，构筑坚固堡垒，建立12处据点，分割封锁我苏中、苏北、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同时，它与沙沟、兴化城的日伪据点相呼应，使苏中军区第1、2分区联系困难。

会后，粟裕随即主持召开会议，

商讨具体作战方案，决定集中5个多团的兵力，由副师长兼副司令员叶飞担任前线指挥，采取攻坚打援的战法，把参战部队临时编为三个纵队：以第7团为主的第二纵队，担任主攻车桥的任务；以第1团为主的第一纵队担任淮阴、淮安方向的打援任务；以第52团为主的第三纵队，担任曹甸、宝应方向的打援任务；另以师教导团和第4军分区的2个营组成预备队。此外，第3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在淮安东北顺河集、凤谷村一线，保障部队的北翼安全。

攻坚打援，夺取车桥。1944年3月5日凌晨1时50分，攻城部队按预定方案出击，战斗打响。攻城部队避开外围据点，采取远程奔袭方法，利用夜暗掩护，从日伪军外围据点之间直插车桥，以隐蔽迅猛动作，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猛烈进攻，直取车桥两翼。突击队员们越过外壕、架起云梯、攀上围墙，展开攻击。不到一小时，我军便次第突破围墙，攻下10余座碉堡，占领镇内全部街道，分割包围镇内各据点日伪守军。随后，在师炮兵大队火力支援和掩护下，新四军采取分散突击、各个击破的战术，逐个攻克敌碉堡，消灭敌火力点。我军突然攻击，使敌完全被动。经过激烈战斗，当天中午全歼镇内一个伪军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在核心工事内。下午2时许，我军接着对日军驻守的土圩及碉堡开展攻击，日军一个小队大部被歼，残敌固守挣扎。

与此同时，新四军强攻车桥，出敌意外，使淮阴、淮安、涟水等地日军极为震惊，增援车桥。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打响。5日下午3时，当第

一批援敌赶到我芦家滩伏击阵地时，1旅第1团预伏部队猛烈开火，迎头痛击。后又韩庄附近闯入第1团预设的地雷阵地，死伤惨重，锐气大挫，被迫退守韩庄。接着，第二、第三批援敌，先后进入韩庄，与第一批残敌会合。第1团采取正面打击和侧后方突击相结合的方式，再给援敌以沉痛打击，迫使援敌退守韩庄。晚7时，援敌再次集中主力企图从正面突破，但遭我军压制，未能得逞。随后，第1团等部对韩庄日军发起总攻，与敌白刃肉搏，歼其大部，残部向西逃窜。其间，日伪军见我正面防御固若金汤，遂纠集200余人，企图乘夜暗悄悄从我狙击阵地右翼向东北进入草荡，摆脱我军，继续增援车桥。我军早有预料。第1团和泰州独立团立即予以堵击，歼其一部，其残部逃向小马庄后也被歼。

6日2时，增援日军伤亡惨重，向韩庄东北突围，在芦家边，被我切成三段，大部就歼，少部在第四、第五批增援日军的接应下，乘车逃窜。在围攻车桥和芦家滩阻击战激烈进行时，宝应、曹甸等地日军百余人，企图向北增援。当进至大施河时，敌触发我预设地雷，同时遭到我阻援部队迎头阻击，被迫原路撤回。7日拂晓，敌援军大部被歼，残部乘隙狼狽逃窜淮安。

乘胜追击，战斗告捷。车桥战役对华中乃至全国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敌驻淮阴地区之华北派遣军第65师团72旅团60独立步兵大队大队长三泽战死，在敌军官兵中引起很大震动。敌军有生力量大部被歼，因兵源不足和战线太长，日军已无力予以补充，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此，驻扎

